

徐通锵 / 著

季羡林 / 主编
中国现代语言学
丛书

语 言 论

——
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语言论

季羨林 主编

中国现代语言学丛书

语 言 论

——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

徐通锵 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长春

(吉)新登字 12 号

0770 / 12

中国现代语言学丛书

语 言 论

YUYAN LUN

——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

徐通锵 著

责任编辑:吴长安	封面设计:李冰彬	责任校对:谢又荣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138 号)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邮政编码:130024)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张:20.25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88 千	印数:0 001—2 500 册	
ISBN 7 - 5602 - 2050 - 9/H·150	定价:29.50 元	

本课题获国家教委“八五”社科基金资助,并列入国家“九五”出版规划项目、国家教委“九五”出版规划项目

序

季羨林

中国语言学有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

但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被西方某一些学者称之为“孤立语”的汉语，不是拼音文字；汉语的词以单个的字为基础，孤立不变，与印欧语系以及其他一些语系的有屈折变化的拼音文字迥异其趣。在两千年的过程中，我们不是没有遇到过外来的拼音文字，比如随佛教而来的梵文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但是，我们从佛教接受的主要是义理，在语言方面，我们只在语音和词汇上受到了一些梵文的影响，对整体汉语的研究，这种影响并不大。

1898年，马建忠《马氏文通》的出版，是一个极大的转折点，标志着汉语研究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他明确声明是受了“西方”的影响。为了把问题说清楚，我还是先抄他的话。他在“后序”中说：

余观泰西，童子入学，循序而进，未及志学之年，而观书为文无不明习；而后观其性之所近，肆力于数度、格致、法律、性理诸学而专精焉。故其国无不学之人，而人各学有用之学。计吾国童年能读者固少，读书而能文者又加少焉，能及时为文而以其余年讲道明理以备他日之用者，盖万无一焉。夫华文之点画结构，视西学之切音虽难，而华文之字法句法，视西文之部分类别，且可以先后倒置以达其意度波澜者则易。西文本难也而易学如彼，华文

本易也而难学如此者，则以西文有一定之规矩，学者可循序渐进而知所止境，华文经籍虽亦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拟而揭示之。遂使结绳而后，积四千余载之智慧材力，无不一一消磨于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而道无由载，理不暇明，以与夫达道明理之西人相角逐焉，其贤愚优劣有不待言矣。

马建忠在这里详细对比了华文与西文之难易、之结构、之优劣、之利弊、之异同、之效用，颇有一些深刻的话，虽然他还没有真正对二者之差异搔其痒处，这是时代的限制使然，不能怪马建忠。马建忠这一番话真正的用意在于指出，华文非按照西文的楷模加以整理不可，整理之道就是写一部华文语法，他称之为《文通》。接着他在下面说：

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而后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其成就之速必无逊于西人。然后及其年力富强之时，以学道而明理焉，微特中国之书藉其理道可知，将由是而求西文所载之道，所明之理，亦不难精求而会通焉。

马建忠写《文通》的做法和目的说得一清二楚。一方面，他想改变传统私塾中教师多强调背诵而忽视讲解的做法；另一方面，其中还隐藏着一点“语法救国”的意味。他说，西文有一定之规矩，其实华文何尝没有一定之规矩？特规矩迥乎不同而已。不管他的《文通》能不能像西文语法那样让人真“通”——我看是“通”不了的；但是他毕竟开始了中国语言学现代化之新风。我们现在都认为，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西化”，马建忠又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证。《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说：“《马氏文通》标志着中国文法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这话是完全准确的。

在中国学术史上，无论是哲学史、宗教史，还是文学史、艺术史等等，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语言学史何独不然。文化交流并不总是在平静祥和的气氛中进行的。比较剧烈的撞击有时候是难以避免的。佛教进入中国就是如此。当然也有比较缓和的评论。

但是撞击或者矛盾或多或少总会有一点的。即以语言学而论,在中外文化交流第一次撞击中,也就是佛教传入的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虽有过极大剧烈撞击,佛教最后终究还是被接受下来,融入中国的哲学宗教思想中。这第一次撞击对语言学的影响不大,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到过,这里不再重复。

中外文化交流的第二次巨大的撞击,我认为,应该说是自明末清初开始的欧风东渐。这一次撞击,对中国学术史、中国宗教哲学史以及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其影响之大绝不下于第一次。但是,对语言学来讲,在最初阶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产生多么大的影响。真正的影响自《马氏文通》始。这一点在马建忠的“后序”中说得清清楚楚,竟无置疑之余地。

从《马氏文通》起到现在整整一百年了。在这一百年内,中国语言学经历了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人们现在常说,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引进西方的理,结合我国的实际进行探索,并不断取得成功的过程。衡之以语言学的发展过程,这话也是适用的。

近一百年以来中国语言学的情况怎样呢?邢福义先生在他的《汉语语法学》(本丛书之一)中,就汉语语法学的分期问题,把这一百年分为三个阶段:一、套用期,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30年代末期。主要特征是套用西方语言拉丁文、英文等等,大约有40年,以马建忠、黎锦熙等为代表。二、引发期,20世纪30年代末期至70年代末期。主要特征是引进西方国家的语言理论,大约40年,以王力、吕叔湘、丁声树、张志公等为代表。三、探求期,70年代末期至现在。主要特征是接收外国理论的启示,而又探求新路子,以求得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大约有20年,以吕叔湘、朱德熙、张志公、胡裕树、张斌等为代表。

邢福义先生分期的意见,就中国语言学整体情况来说,大体上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能够为大家所接受的。除了上面提到的语法学家外,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语言学家还有赵元任、李方桂、

罗常培等。在过去一百年内,中国语言学走了一条由套用到探求的道路,是符合逻辑发展的。中国语言学亦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果。从著作的数量上来看,超过前此的任何一个一百年。这一个事实,无论谁也否定不了的。成果中的最新部分就表现在我们现在出版的这一套丛书中。

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是全方位的,既有汉语语言学的发展,普通语言学的探求,更有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突飞猛进。我们这套《中国现代语言学》丛书,有语言的总体把握(徐通锵:《语言论》),有方言、语法的研究(詹伯慧:《汉语方言学》、邢福义《汉语语法学》),有少数民族语言的探索(孙宏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学》)。可以说,这是探求期的承前启后的成果。

邢先生称最后一个阶段为探求期,仅仅有 20 年历史,少于前两个阶段。但是前两个阶段已告结束,而探求期怎样呢?

这个问题邢先生不可能答复。由于限于一百年的框架内,前两期占了 80 年,只剩下了 20 年,所以邢先生只能谈 20 年。过了这 20 年,就到了 21 世纪,是框架之外的事情了,也是在邢先生讨论以外的事情了。他当然不能讲得很多了。我现在来替他回答这个问题:探求只能说是刚开了一个头,探求正未有穷期。我们只能探求,探求,再探求。

根据我的浅见,当前我们的探求已经触及汉文和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文字的根本差异。但是,我认为,还很不够。语言文字是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而思想的基础或出发点则是思维模式。东西方思维模式是根本不同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分析,分析,再分析,认为永远可以分析下去的。而东方的思维模式则是综合,其特色是有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的概念。只要你注意,这种基本差异随时可见。我只举一个很小的例子,西医治病,往往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而中医则是治头痛可能在脚上扎针,其余可以此类推。

综合的东西往往具有一些模糊性,中国语言也不能例外。在过去,人们往往认为,模糊不是什么好东西。而到了今天,世界上一些先知先觉者已经发现,世界上很少有百分之百绝对清晰的东西,而模糊性倒是一些事物的本质。20世纪西方新兴的学科中,有两门引人瞩目的学问,一门叫模糊学,一门叫混沌学。顾名思义,讲的就是模糊和混沌,而这两种新学问又偏偏出自自然科学家之手,前者出于要求绝对清晰、绝对准确的数学。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无论如何,这同西方的分析的思维模式是有矛盾的。据我看,模糊论和混沌论也是用分析方法得来的结果,并不是东方感悟的收获品。这样就要值得人们去反想了。

时至今日,世界上科学发展的方向是:文理科界限越来越不分明,两者的关系是互相渗透,互相融合。模糊论和混沌论就是两个具体的例子。我们中国语言学家应当抓住这一点,继续进行探求。特别是对汉语的模糊性特色要多加注意,多加探求。我在上面曾说到,中国语言的探求期才只有20年的历史。下一个世纪的前20年,甚至在更长的时期内,都是我们探求的时期。我们必然能够找到“中国的特色”。只要先“擒”这个“王”,我们语言学的前途,正未可限量。只要能摆脱西方理论的影响,充分发扬我们自己的语言和理论,我们必然能够一反现在无声的情况,在世界语言学界发出我们的声音,而且是宏亮的声音。在21世纪100年中,同现在这100年相比,我们必然能取得更辉煌的成果。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中国语言学界未来的任务,这就是我们探求的方向。

1996年6月10日写毕

自序

这是一本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理论语言学著作。

汉语有悠久的语言研究历史，与希腊—罗马、印度的语言研究一起构成了世界语文研究的三大传统。每一个传统都有自己的特点。汉语研究的传统重实际语言材料的整理与研究，很少进行理论的探讨，因而我们的祖先没有给我们留下系统的理论语言学论著。现在流行的语言理论都是从西方语言学中引入的。这样，“中国没有自己的语言学理论”，“所有的语言理论都是外来的”就成为汉语学术界的一种通论。面对这样的议论，从事语言研究，特别是从事语言理论研究的人一方面不得不承受这种压力，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这种严酷的、与国家的学术地位不相适应的现实。从无到有，在建立一门新学科的初期，介绍和引进是必要的，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立论精神以发展自己的语言研究，也是完全正确的，但老是躺在西方语言理论、方法的“大床”上咀嚼人家“吃”过的东西，总不是发展学术研究的正确和有效的途径。正确的办法应该是“结合”，把西方的语言理论和汉语的研究结合起来，揭示汉语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阐释它的普遍理论意义。但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吕叔湘，1986b）。自《马氏文通》以来，中国语言学基本上是用印欧语的理论、方法来分析汉语，探索“结合”的道路，虽然开创了语言研究的一个新时期，但是也给汉语的研究带来了“印欧语的眼光”，用印欧语的结构原理来观察汉语的结构。追溯这

方面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缺乏一个正确的立脚点。以往的“结合”基本上以印欧系语言的理论、方法为基础把汉语结合进去研究，而不是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去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立论精神，因而难免出现用西方的语言理论来观察汉语的结构这样的弊端。根据百年来的“结合”的经验教训，我们想转移“结合”的立脚点，就是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立论精神，阐释汉语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为语言理论研究开拓一条新的途径。这一设想实在是“雄心可嘉，壮志难酬”，不自量力。但是，“中国没有自己的语言学理论”的状况总得设法改变，总得有人迈出第一步，哪怕摔倒了，碰得头破血流，也可以给后人做一块“此路难行，过往行人，小心在意”的路标。鉴于此，我们也就不自量力地去走这艰难的第一步。

我们清楚地知道，前进的道路荆棘丛生，为了减少阻力，尽可能把“路”走得好一点，稳一点，差不多化了近 20 年的时间，分三个阶段摸索前进。第一阶段（1978—1981）是和叶蜚声先生一起，从总结入手，考察“五四”以来汉语语法研究和音韵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便从中了解中西语言学的“结合”的成效和局限。我们发现，音韵研究的“结合”的成效远远强于语法研究，因为音韵研究没有离开自己的传统，而语法研究由于一切需要从头做起，受西方语言理论的束缚太大。这一考察对我们后来的研究很有启发。第二阶段（1982—1986）是联系汉语方言和音韵的研究，吸收西方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撰写专著《历史语言学》。这一阶段我们对“结合”的研究有了一点深切的体会，就是在文白异读的研究中总结出一种新的叠置式音变的理论和方法，丰富了现行的历史语言学理论。这说明，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是可以总结、提炼出相关的理论和方法的。我们这两个阶段的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一些鼓励，因而增强了我们在“结合”的道路上继续探索的勇气和信心。从 1987

年开始，我们进入了第三阶段的探索，前后历经10年，走了很大一段弯路，才写成现在的这一本《语言论》。头5年，以语言变异的研究为基础，探索语言系统的动态运转规律，想突破索绪尔的静态语言系统说。写了几篇文章后发现，以汉语方言变异的研究为基础进行语言理论建设，虽然可以在局部问题上对现有的理论提出一点补正，但无法建立一种适合于汉语研究的理论框架；如果要在整体上有所突破，光说“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还不行，必须找到汉语结构的基点。在汉语音节结构规则的指引下，我们终于找到了“字”，觉得在“结合”的道路上汉语音韵研究、方言研究的成效所以强于语法、强于语言理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字”。习惯的力量是顽固的、可怕的。我提出“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之后，从我的同事、朋友到学生，差不多都反对，认为“字”是视觉的符号，是书写的，属于文字的范畴。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字”首先是说的，其次才是“写”的；我们要人家说得慢一点，只能说“你一个一个字慢慢说”，绝不会说“你一个词一个词慢慢说”，即使是语言学的泰斗也不例外。这就是说，字是汉语社团中具有心理现实性的结构单位，仅仅把它看成一种书写的符号，实在有点儿本末倒置。我坚信这一观察的正确性，认为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进行语言理论的建设就得以“字”为结构本位去探索前进的道路。另一方面，我也很幸运，就在我“四面楚歌”的时候，清华大学为纪念赵元任先生诞辰100周年而翻译出版了他的论文集，其中《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一文明确提出汉语没有与英语的word相当的结构单位，“汉语是不计词的，至少直到最近还是如此。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权威学者的话是有分量的。赵元任先生的论断改变了一些人的看法，也减轻了我们前进的阻力。

字与词尽管只是一字之差，但涉及整个理论体系的改造，涉

及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和语言结构的差异。这是由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而形成的不同的发展道路。70年代发展起来的混沌理论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所谓“蝴蝶效应”。1979年12月,洛伦兹在华盛顿的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一次讲演中指出: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有可能会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从此以后,“蝴蝶效应”不胫而走,名声远扬。这种“效应”的核心意思是:初始条件的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放大,对其未来的状态会造成极其巨大的差别。我们对混沌学不甚了了,但我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古训,意思与这种“蝴蝶效应”完全一致。我们强调字与词的差异就是想关注初始条件、初始状态和理论出发点的“失之毫厘”的微小差异给语言结构带来的“谬以千里”的巨大影响,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相应的语言理论建设。印欧系语言以词为基本结构单位,它的研究重点始终是语法,从亚里斯多德到现在,这种重点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汉语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它的研究重点就不能是印欧语类型的那种语法,而是语义。语义是语言学各个领域研究中基础最薄弱的一个部门,难度最大。有人把它比附为“泥潭”,陷进去就拔不出来,直至没顶。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闯”这样的“泥潭”?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任何复杂的现象都隐含着一条驾驭它的简单线索,这已为科学发展史所证明,但问题是如何去发现这种线索;第二,坚信传统,相信在悠久的汉语研究传统中隐含着我们必须继承和发展的真理。汉语研究传统虽然具体表现为文字、音韵和训诂,但其核心是语义。《尔雅》、《说文》系列的著述和古籍的注疏都是经典的语义分析,虽然散见于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中,缺乏系统性,但无疑已为我们进行语言理论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何吸收传统的研究成果,用系统性的眼光来观察语义的结构?我们参照汉语社团“比类取象”、“援物比类”的两点论思维方式的特点,提炼出“向心”、“离心”这两个概念,即以

“类”为经，以“象”为纬，“向”纵“离”横，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观察汉语纵横交叉的语义结构网络，建立语义句法的框架。这是统率全书的基本线索，也是我们以“字”为基点进行语言理论建设的粗浅思路。我们想以此为基础，一方面吸收西方语言学中于我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设法实现中西语言学的结合和现代语言学 with 汉语传统研究的结合。至于这两个“结合”的成效和得失利弊，限于我们的水平，而且是初创，肯定有诸多我们自己难以觉察的弊病。这只能由读者去评说、补正和改进了。

本书的主要内容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的“语言研究方法论”课程中讲授过，在教学的反馈中受到不少启发。王洪君、郭锐、李娟等同志曾随班听过一个教学过程，并参与了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很好的意见。博士生叶文曦在听课的基础上还选择字义的组配规律撰写学位论文《汉语字组的语义结构》，提出字义的结构格式。这些意见和研究对完善我们的分析、提高本书的质量都很有帮助。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不远千里前来约稿，而后又多次奔波，编辑加工，费了很大的精力。值此本书出版之机，谨向这些协助过本书的编写、出版的同志致以诚挚的谢忱。

1998年是《马氏文通》出版100周年，也是我的两个母校宁波中学和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谨以此书敬献给培育我成长的前辈和母校，以资纪念。

徐通锵

1997年3月16日于北大寓所

目 录

绪论：西学东渐和中国的语言学

一	语文研究的三大传统和它们的相互结合·····	1
二	“印欧语的眼光”和汉语的研究·····	5
三	字的研究和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的 途径·····	11

第一编 一般原理

第一章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	19
一	两种对立的编码原则和语言研究·····	19
二	音义结合的理据性和汉语的编码机制·····	28
三	编码方式与思维·····	38
四	语言的两种结构类型·····	52
第二章	语言的结构原理·····	56
一	共时、历时的划分和静态的语言系统说·····	56
二	变异和动态的语言结构·····	66
三	结构关联和语言的自组织性·····	78
第三章	印欧系语言的结构原理·····	91
一	“主语—谓语”结构和印欧系语言的结构 基础·····	91

二	词的结构与“主语—谓语”框架的结构关联	98
三	重音在结构关联中的地位和音系的研究	106
四	语义的研究和它对印欧语结构关联的冲击	112
第四章	汉语的结构原理	119
一	字和汉语的结构关联	119
二	音节与字音的结构	127
三	字的顽强的表义性和汉语语义型语言的结构特点	135

第二编 音 韵

第一章	声母和声母系统	143
一	声母和声母位置上辅音的运转规律	143
二	介音的作用和声母的演变方式	150
三	i 介音和汉语声母系统的历史演变	160
第二章	音系的结构原理和元音系统的演变	170
一	汉语的韵母系统和音系的非线性结构	170
二	音核和元音的运转方式	182
三	离散式音变和音系结构的调整	189
四	合口韵的形成	197
第三章	韵尾的变化和阴阳对转	202
一	韵尾的变化和音系结构格局的调整	202
二	阴阳对转和它的性质	205
三	现实方言的“阴阳对转”和叠置式音变	211
四	阴阳对转和方言差异	215
五	《广韵》阳声字的阴阳异切和它的文白异读的 性质	220
六	汉语语音演变的机制	224

第四章 声调的性质、起源和发展	230
一 字和声调.....	230
二 音节内部响度变化的规律与声调的起源.....	236
三 汉语声调系统的成因和定型.....	244
四 汉语声调的演变.....	256

第三编 字和汉语的构辞法

第一章 字和汉语的理据性编码机制	265
一 “六书”和临摹性编码.....	265
二 声训和理据.....	274
三 理据和语言的结构.....	288
第二章 字族和汉语的语义结构	295
一 字族和字义结构的基本原则.....	295
二 向心性字族和语源研究(上):声训论和 “右文”说.....	306
三 向心性字族和语源研究(下):上古音系 的拟测和字族的构建.....	316
四 离心性字族和字的本义的研究.....	324
第三章 结构的不平衡性和单字结构格局的解体	334
一 编码体系的结构不平衡性和结构格局的调整.....	334
二 单字结构格局和联绵字的“一分为二”.....	343
三 联绵式的结构和理据性编码机制的转移.....	348
四 双音辞的形成和单字编码格局的解体.....	355
第四章 核心字和汉语的语义构辞法	362
一 汉语构辞法的性质.....	362
二 核心字和汉语构辞法的基本原则.....	364
三 向心构辞法和它的语义基础.....	369